



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新闻背景

致公党中央建议 加强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本报记者童克难北京报道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致公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沿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提案》。

提案指出,沿海海域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面临诸多问题:一是水下文物盗掘、盗捞、倒卖等不法行为依然存在,保护形势较为严峻。二是海洋水下工程、捕捞作业以及海洋经济建设的扩大,给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三是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间较短,体制、机制尚不够健全。四是水下文化遗产分类分级体系及保护区划定、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以及水下考古发掘海域使用论证方面基础薄弱,相应的保护措施仍需加强,水下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体系不足。

对此,提案提出5条建议,积极开展沿海水下文化遗产普查;加大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科技投入,创新遗产保护方式;科学处理水下文化遗产原址保护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制定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分类分级体系及保护规划方案;实现保护性旅游开发。

专家建议

水下陆上结合 连贯历史线条

记录人类文明、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不仅存在于陆地,也深藏于水下或海底。但由于目前存在探查难、打捞难、投入大、保护难、产业化难、回报小等问题,有人质疑,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后期经济回报不成正比。

不过,致公党福州市委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调研组副组长杨宏云认为,看待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要打开思路。

■ 开发意义

承载海洋文化软实力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意义重大。“我国要建设海洋强国,就需要有海洋文化软实力支撑。”杨宏云说,一方面,可以借此培养公众对海洋发展的自豪感和重视度,另一方面,水下文化遗产可以作为历史见证,尤其是一些沉没的商船,有助于佐证先人对有关岛屿的命名事实。

“我们要从历史中找寻当下事物的线索。”杨宏云说,水下文化遗产足以说明,中国原本是海洋大国,海上贸易活动频繁。同时,一些沉没商船上的文物史料也显示,“海上丝绸之路是和平安友好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之路。”

■ 开发思路

水陆结合,让历史一脉相承

加强水下文化遗产开发,应从何处着眼?

杨宏云认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不能只讲水下文物。“海里的文物只是历史的一个小片段,要把水下和陆上结合起来,让历史线条连贯。”比如,一艘商船出发前的陆上准备是什么样的。

福建省泉州市的九日山上,有一处非常珍贵的历史古迹——祈风石刻群,记录了宋元时期商船出发前的祈福过程。当时,泉州海上交通发达,连接东南亚,每天有大量船只进出港口。为保平安,商船扬帆之际,泉州郡守和市舶司有关官员及泉州知名人士,会登上九日山祈风,并刻石留记。与之类似,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也在江苏南京、福建长乐等东南沿海地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足迹和文化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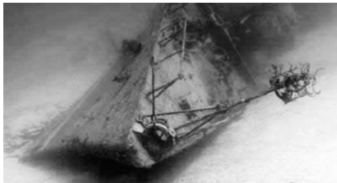
把水下文化遗产的开发、展示和陆上文化遗迹相结合,深挖文物背后的文化价值,那么,公众的欣赏体验就不只停留在看山、看海的观赏层面,而走向对中华文化的探寻。

守护沉睡波涛下的历史密码

相关链接

我国重大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南海1号”沉船



“南海1号”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船。1987年,它在广东省阳江海域被发现,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船上载有文物数万件。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2007年,“南海1号”被整体打捞出水。目前,依托“南海1号”建成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已向游客开放。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中,被誉为水下碑林,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梁上汇集的300多名文人墨客以8种书体留下的3万余字题刻,具有令人惊叹的艺术价值,其中尤以宋代大文豪、书法家黄庭坚的“元符庚辰涪翁来”题刻最为著名。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题刻永沉江底。为了让后人能观赏这一文物,国家投入资金建设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它位于水下40米处,相当于在原址上修建了一个保护壳体,游客可漫步水下环形走廊进行参观。

文化热点

■ 对话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
■ 采访人:本报记者陈妍凌

建成覆盖全国的水下考古工作网络

水下考古通过实证材料,会修正以往对历史的认知

记者:请您简单介绍我国的水下考古?

姜波: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发端于20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东南亚地区发现了多艘水下沉船,船上有大量中国文物。这些文物被大量盗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讨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发展水下考古。

海洋勘探技术在水下考古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针对海洋、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等产生的水下遗产。水下考古获取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往往大大突破常人的想像。瑞典曾对一艘沉船进行水下考古,一次性出水文物茶叶68万磅、完整瓷器23万件。可以说,一艘沉船,就是一所博物馆。

记者:我国近年来的水下文化遗产考古,有哪些新的发现?

姜波:水下考古通过实证材料,会修正一些以往的认识。比如,致远舰的发现,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们对甲午海战的认知。

过去有人认为,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摆出雁形阵应对日本的一字阵,是因为清军贪生怕死。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看法并不成立,双方阵型和武器装备有关。日本装备的速射炮都在船舷的一侧,所以用一字阵,以船侧面向敌人,集中火力。而清军舰杀伤力最强的是舰首和舰尾的主炮。所以丁汝昌采用了舰首向敌,随着旗舰以雁形排开的布局。

再比如对“南海一号”沉船的打捞和研究。以往我们对南宋时期海外贸易状况了解并不多。但是“南海一号”让我们发现,南宋时期的海上贸易非常发达。除了瓷器作为消费品出口外,铁器也占有重要地位,“南海一号”中约有60吨铁器。可见,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规模远远超过今人的想像。

水下文化遗产盗捞现象近年有所遏制

记者:沿海地区水下文物盗掘、倒卖等不法行为较多。请问,我国水下文物盗掘现状如何?

姜波:我国水下文化遗产盗掘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渔民作业时打捞出水文物,非法据为己有;二是打捞公司专门从事水下废铁打捞和销售,有时它们会打捞到沉船,非法占有;三是专门的文物盗掘分子,针对水下文物开展盗掘。

记者:水下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国家都应承担起保护责任。目前,盗掘势头是否得到有效遏制?

什么是水下文化遗产?

水下文化遗产是指至少100年来,周期性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

生存的遗迹,比如遗址、建筑、房屋、工艺品和人的遗骸,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船只、飞行器、其他运输工

具或上述三类的任何部分,所载货物或其他物品,及其有考古价值的环境和自然环境;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

姜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我国水下文物盗掘现象严重,尤其在福建、广东和西沙海域。但近几年,我们加大了打击力度,盗掘势头有所遏制。有两个很典型的打击盗掘案例。一个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张献忠江口沉银”案,涉案金额3亿元,追回文物千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100件,国家一级文物8件,目前已有七十人被判刑。二是福建漳州地区文物执法部门多年来和边防部门合作破获了一系列文物盗掘案件。

未来,我们需要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宣传,也要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建立长效机制,遏制盗掘行为。

建立保护机制应立足本国实际,吸纳世界经验

记者:国际层面如何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姜波:2001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下称《公约》)正式生效。《公约》规定,水下沉船一定要进行科学的考古和发掘,不能进行商业打捞。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水下文化遗产大国已经加入了公约。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虽然没有加入,但非政府组织已经广泛参与国际公约组织的相关活动。

记者: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沿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从单一的水下考古走向全方位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请问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有什么特点?

姜波:一是设立了国家级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专门机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除了中国、法国、韩国和泰国,大多数国家没有这类专门机构。

二是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平台,实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现了“全国一盘棋”,执行力很强。我们建成了覆盖全国的水下考古工作网络。总部设在北京,海南、青岛、福州、宁波、武汉等地设有水下考古基地,在广东阳江还设立了水下考古培训基地。

三是随着海洋强国建设的推进,沿海各省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这项事业近些年发展很快,中国可谓后发先至。

记者:能否介绍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分级分类体系?

姜波:《公约》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有4个原则,即原址保护、公众参与、青少年教育和国际合作。我国实行文物保护单位分级管理制度。文物保

护单位分为3级,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国的水下文化遗产也在按照这3个级别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设立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

由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任务艰巨,专业考古人才储备不足

记者:现阶段制约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主要工作任务有哪些?

姜波:一般来说,制约一个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因素是人才、技术装备和经费。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经费较为充足,技术装备也很先进,问题主要在于工作任务繁重,而人才相对不足。

国家文物局已经举办过7期水下考古专业人才培养班,获得资质的大约有120余人,能够常年在一線开展工作的大约60人左右。但是,中国是水下文化遗产大国,而保护工作起步晚,要做的工作非常多。所以,相对于目前要开展的工作,人才数量严重不足。

我国海域面积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内水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这些都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区域。目前,我们正在对重点区域开展水下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为文化遗产建立档案。同时,我们正在建设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数据库,预计将花费5年时间,对重点区域、重点遗址的数据进行整理。此外,为了尽可能降低海洋工程对水下文化遗产的影响,目前正在酝酿配合海洋工程开展水下考古的工作机制。

记者:如何对我国水下考古人才进行培养?

姜波:目前,专业的水下考古人员稀缺,现有人员几乎都同时撑着2个~3个项目的开展。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我们正从现有的考古队员中选拔培养,训练他们的潜水和水下作业技能,把考古和潜水结合起来。具体包括潜水技能培训、水下考古实习和进阶培训3个阶段,使队员掌握水下摄影、测绘等多种能力。

国际上,聘请水下考古志愿者开展水下考古是通行做法。但是他们有一系列完善的保险保障和管理机制。我国在这方面还不成熟。

所以,我们水下考古方面,一般会聘请潜水台班,承担水下考古过程中的工程化事务,比如抽泥。而具体的文物处理,则需要水下考古人员来操作。

记者: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未来的工作方向是什么?

姜波:我们将会秉持“沿海为主、兼顾内水和远海”的原则,并有计划地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水下考古国际合作。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

才能让群众“点赞”

据新华社电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当前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仍存在有数量、质量问题。只有让群众“点赞”,群众才能给公共文化服务点赞。

雒树刚直言,现在一些文化产品和服务粗制滥造,甚至存在群众反感的低俗、媚俗、庸俗问题,成为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他指出,文化部门要大力培育文化精品意识,多向人民群众提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多提供寓教于乐、打动人心、群众愿意听、愿意看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多提供使人的心灵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要大家办,把政府独唱变为政府和社会的合唱。”雒树刚说,在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供上,要把政府送文化和群众要文化结合起来,即把政府的“送菜”和群众“点菜”结合起来。“只有让群众‘点菜’,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提高效率,增强实效性,群众才能点赞。”

全国人大代表鲁贵卿

重视深度阅读和传统文化

本报综合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鲁贵卿说,近年来,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浅阅读”取代纸质图书“深阅读”的趋势愈发明显,他建议将孔子诞辰日设为“全民读书节”,希望唤起大家对深度阅读和传统文化的重视。

鲁贵卿说,设立一个节日不是搞形式,而是因为目前全民阅读缺乏一个概念落脚点和影响力抓手,有了节日才能吸引大家的关注。

鲁贵卿指出,如今阅读的“功利化”倾向严重,大家对经典著作的关注度在降低,他建议,“全民读书节”可定在每年的9月28日。9月28日是孔子诞辰日,选取这一天作为“全民读书节”,对于激发群众阅读经典的热情、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民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鲁贵卿还强调,在呼吁回归纸质图书阅读的同时,也应重视并积极引领数字化阅读朝正确方向发展,要加强网络管理,打造健康、优质的网络阅读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臧永清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加强国民礼仪传承

据新华社电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日前表示,“在先贤孔子提出的‘六艺’中,礼是排在第一位的,可见礼仪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要落实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要加强国民礼仪教育。

对此,臧永清建议,要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不同层面的国民礼仪建设指导机构,为国民礼仪教育工作提供组织上的保障。整合各种媒体资源,大力宣传和倡导文明礼仪,努力在国民中形成以礼仪文明为荣、以礼仪缺失为耻的社会共识。同时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组织编写“国民礼仪手册”;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讲座、宣传和普及礼仪知识。重要的是要对涉及文明礼仪较多的人群进行重点培训,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商务人士、出境旅游人士等。

中国文化具体应该如何“走出去”?臧永清以中国出版“走出去”为例,建议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策略。他表示,国家可以支持或扶持一些有能力的出版机构到国外去并购相关企业。借助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力,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可以更顺畅。对不发达的、经济上有困难的国家和地区,则采取提供服务的方式。